

二、积极策划武装侵占中国东北

1 经济危机加速侵略步伐

一九二九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很快袭击日本，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我国东北的步伐。

这次经济危机使日本社会呈现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剧减，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工人工资被减低，失业人数空前激增，到一九三〇年达三百万人。日本农村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尤为严重。一九三〇年，依靠美国市场的生丝价格，突然暴跌了一半，使占农民总户数百分之四十的养蚕农家陷于最困苦的境地。一九三〇年秋天，稻谷空前大丰收，米价却陡降一半，出现了所谓“丰收饥谨，谷贱伤农”^①的悲惨情景，谷物、生丝、蔬菜价格惊人地下降，使得农民愈发穷困，徬徨在“生死的歧路”上。

经济危机加深了日本的政治危机，日本工农运动和人民斗争的火焰日益炽烈。如一九三〇年的工人斗争，增至二千二百八十九次，参加人数达十九万人以上，打破了过去最高纪录。农村中的租佃纠纷也越来越严重了，一九三〇年为二千四百多次，到一九三一年一跃增为三千四百多次。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农民斗争次数增加一倍，流血事件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斗争的矛

^①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1，1959年中译本，第82—83页。

头，直接指向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天皇制政府。日本统治集团连连不住地惊呼“赤化”革命危机临头！

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使日本国内的工农运动激化，而且也促使朝鲜、台湾的民族运动激化了。长期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朝鲜和我国台湾省，掀起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风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爆发了朝鲜学生的反抗运动，到一九三〇年便发展为全朝鲜学生的反日斗争，参加人数达五万四千多人。一九三〇年，朝鲜各地工人举行罢工，并和宪兵、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一九三〇年，台湾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暴虐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东北，早就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日斗争日益高涨。在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推动下，张学良的民族觉悟有所提高，并对日军杀害他父亲张作霖一事深怀不满。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他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时，与国民党政权妥协，悬挂“青天白日旗”，并着手修建与“满铁”平行的铁路，开工修建葫芦岛港，这样，“满铁”感到自己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威胁，引起日本侵略者的不安。

本来，中国东北丰富的资源宝藏已成为日本垄断资本家掠夺的对象：鞍山供给铁，抚顺供给煤，从吉黑的大森林取得木材，这样从满蒙可以绰绰有余地供给日本三亿日元。日本又大搞对外投资，在中国东北的外国资本中，七成以上是日本资本。到一九三一年末，日本向中国东北投资总额达十七亿五千万日元^①，使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重要场所。所以，中国东北经济的荣衰与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有生命攸关的关系。而当时东北经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负有盛名的大豆、豆饼等农产品的出口

^① 参考日本藤原彰：《日本近代史》Ⅱ，第16页。



张学良

额也显著减少。一九二九年大豆出口额为三百万吨，到一九三〇年则激减至二百二十三万吨^①；大豆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见下表）也大为降低，从而引起了深刻的农业危机。中国东北居民因

东北农产品价格指数（1920年 = 100）

		1929年10月	1931年10月
大 高 粟	豆	105.1	46.2
	粱	137.7	55.4
	粟	146.8	71.0

资料来源：满铁经济调查会编：《满洲经济年报》，1933年版，第225页。

① 《太平洋战争史》1，第224页。

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而减低了购买力，使日本和中国东北的贸易整个缩减，同时也使“满铁”的收入激减，甚至第一次出现了赤字。如一九二七年“满铁”的收入为一亿二千二百一十万日元，到一九三一年则激减到八千五百四十七万日元^①。

满铁经营的不振、经济危机的打击以及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高涨，更加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感到恐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正象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摆脱危机，寻找出路，便把侵略中国东北作为一个“救命符”，悍然走上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当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以垄断中国东北市场来寻求摆脱危机的活路，而且还企图把东北变为镇压中国革命的据点和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前哨阵地。当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因受严重经济危机的袭击，自顾不暇，无力和日本争夺，同时他们也企图利用日本充当远东反苏反共的先锋。再加上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正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无暇顾及东北。所有这些情况，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看来，都是发动侵占中国东北战争的好时机。

2 右翼势力的蠢动

当时，日本进步势力反对侵略战争，但日本政府采用法西斯

^① 参考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17页。

手段，镇压了反对战争的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如以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起诉的，一九二九年有四千多人，一九三〇年增至六千多人，一九三一年则达一万人以上。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需要用法西斯手段加速扩充军备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进程。

日本反动政府在疯狂镇压左派的同时，积极支持法西斯右翼势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为发动“九·一八”事变作舆论准备。

当时，不仅主张对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黑龙会”^①等老牌右翼团体异常活跃，而且又新出现了“血盟团”、“国粹大众党”、“大日本生产党”、“爱乡塾”等法西斯组织。参加这类组织的多半是反动政客、财阀和法西斯军人，他们都疯狂地叫嚣：“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被日本反动派所赏识的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在日本参谋本部的唆使下，于一九二九年间，周游日本各地，极力鼓吹“满蒙”是“日本生命线”，叫嚷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所谓“八紘一宇”、“皇道主义”的“侵略经”，就是这个黑帮头子大川周明所鼓吹的。所谓“八紘一宇”，就是要用军事侵略方法征服世界，把全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并胡说什么“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使命”。

一九三〇年，当日本经济危机加深的时候，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招摇过市，群魔乱舞，开始了新的蠢动。最引人注意的是，同年九月，日本军部的一群法西斯军官，以桥本欣五郎、板田义郎、根本博为中心，成立了秘密组织“樱会”^②，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和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他们拟制了一份“宗旨

① 1901年，以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为宗旨成立了黑龙会，头目是内田良平和头山满，纷纷派特务来华，刺探情报，准备侵华战争。

② 参考日本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第320页。

书”，①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其中指出日本内政外交政策已陷入了绝境，“农村陷于荒废、失业和不景气”、“糜烂文化的空前泛滥”、“官吏的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等等”。“宗旨书”把这种不安和腐败现象，都说成是“来自政党分子唯私利私欲是图，毫无为国效劳之大计”。②然后，他们表示“虽然不该直接参与国政”，但却发誓要“为整饬执政者和加强国力而效劳”。实际上，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政党内阁，废除议会政治，建立军人法西斯专政。在“樱会”纲领中，明确提出“本会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③”。他们认为“如欲积极解决‘满蒙’问题，必须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④

“樱会”的活动，是得到日本军部高级将领支持的，并与关东军和参谋本部有秘密的勾结。如建川美次少将（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军省军事课长）等高级将校，与“樱会”骨干分子、关东军高级参谋都是相互勾结的。例如，一九三〇年末，日本参谋本部制订“一九三一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⑤与会者闻之哑然失色，唯有建川部长表示同意“樱会”分子的主张⑥；又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永田大佐奉命到中国东北进行所谓“视察”，在沈阳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相遇，密谋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问题，他表面上装作慎重，不同意关东军增加兵力的要求，但在“暗中却支持关东军的武力解

① 中野雅夫编：《桥本大佐手记》，第29—33页。

② 中野雅夫：《桥本大佐手记》，第29—33页。

③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第20页。

④ ねず・まさし：《日本现代史》，日本三一书房1972年版，第7卷，第137页。

⑤⑥ 中野雅夫：《桥本大佐手记》，第85页。

决方针”。结果，他答应从日本拨给关东军两门大炮^①，以备进攻沈阳城之用。

尽管浜口首相卖力推行扩军备战政策，但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仍认为他很不得力。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晨，浜口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青年暴徒的袭击，身负重伤。于是，“樱会”骨干分子认为这是发动政变的好机会，与右翼头子大川周明等勾结，密谋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发动法西斯军事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相的军事独裁政权，以便侵占中国东北。参预这个密谋的，是“樱会”的中心人物，其中包括参谋次长二宫重治中将、陆军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等高级首脑。宇垣起初也期待实现这个计划。然而由于这次政变计划不周密，再加上冈村宁次、永田铁山等主张先侵略“满蒙”，而反对发动政变，起了内讧。同时宇垣也得到一项情报说，不采用这种手段自己也能当上首相，于是下令不要发动政变，因而使这个阴谋计划未能得逞。这就是所谓“三月事件”。政府得知这一阴谋事件以后，因为牵涉到军事首脑参加在内，既没有追究责任，也没有给予处分，只是将与“樱会”有关系的一些将校，调到关东军参谋部和其他部门，继续担任放火者的角色。对此，这些阴谋策划者引为庆幸，从而越发加紧策划“九·一八”事变。

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侵略中国东北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矛盾，只是在作法和步骤上有点差异。对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家说来，头等重要的是从经济上控制“满蒙”，而军部则把军事和政治观点摆在第一位，企图早日占领“满蒙”，变为在日本军事统治下的殖民地。日本军部认为：（一）侵占“满蒙”可以转移日

^① ねず・まさし：《日本现代史》7，第162页。这两门大炮即是“九·一八”事变时用以攻打沈阳城的24厘米的两门榴弹炮。

本人民的视线，缓和国内阶级斗争，同时又可以利用军事上的“成就”，压制反军部势力，企图实现法西斯军事专政；（二）侵占“满蒙”可以抗拒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并为干涉中国革命建立据点；（三）侵占“满蒙”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反抗美国的可靠军事基地。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法西斯军官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讲话中，合盘托出了这种侵略观点，他叫嚷：“满蒙”是日本“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坚决进行了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结果，在大陆的一角建立了特殊地位”。“由于日本帝国掌握了满蒙这个战略枢纽之地，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退而可以保卫朝鲜，进而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所以，在战略上“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①板垣的这套反动谬论，正反映了日本军部中一小撮法西斯军官的观点，同时也是“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翻版。日本军部反对单纯用外交的和平手段，而要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这样在国内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和日本军部骨干分子的活动相配合，在日本政界和政党中间，也有一小撮分子出面进行煽动，并叫嚷“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在政友会中，森恪早就是侵华的铁杆分子，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也不甘落后，跳出来叫嚷：“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②当时，“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叫器，充斥报章杂志，连篇累牍。

① 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39—144页。

② 《太平洋战争史》1，第247页。

3 军事侵略部署

从一九二九年起，关东军参谋以板垣征四郎^①、石原莞尔^②等为中心，组织四次“参谋旅行”，秘密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暗中制订侵占我国东北的作战方案。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两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一万零几百人，因此，石原密谋“以寡制众”^③。

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他们到长春、哈尔滨等地作第一次“参谋旅行”，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讨论，如对怎样“攻击哈尔滨和防御海拉尔的问题”、“关于占领地区怎样统治的问题”，都进行了秘密研究^④。

不久，板垣、石原等又到辽西等地作第二次“参谋旅行”。在这个期间，他们既暗中研究攻打锦州等地的地形，又研究了“现地战术”，并制订了“夜袭弓长岭的现地研究”、“攻打奉天城要领”。^⑤他们认为“奉天”城墙坚固，用炮轰和炸药炸都有困难，因而研究选取易攻部位作为突破口，命令佐久间大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花费很多时间，终于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完稿，受到关东军三宅参谋长和石原的表扬。一九三〇年五月，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⑥，亲自来东北率领关东军参谋作了一次

① 板垣征四郎，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② 石原莞尔，1928年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

③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日本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62—363页。

④ 同上书，第366页；参考日本本庄繁：《本庄日记》第301—308页。

⑤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371—372页；《本庄日记》第309—311页。

⑥ 畑俊六后任日本侵华军司令官，并任陆军大臣。

“参谋旅行”^①，策划侵占我国东北的罪恶勾当。

自一九三一年初起，每逢星期六，关东军参谋都要参加策划和研究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满铁调查课、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有关人员，也参与了阴谋策划^②。

上述大量事实说明：早从一九二九年开始，日本军部尤其是关东军，按照“东方会议”的方针，在进一步阴谋策划、制订侵占我国东北以及侵占后的统治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三一年四月，日本军部调动多门中将率领的第二师团到东北来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出生的，适于在中国东北作战^③，这一切暴露了他们在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充分准备。五月二十九日，板垣在第二师团干部会上大肆煽动说：日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最终目的，是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制其于死命的地位”。^④

与此同时，日本军部也策划侵占我国东北的方案。一九三一年六月中旬，日本军部秘密指派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久雄和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在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分析和研究对策，制订了一份《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⑤。这个“大纲”主要内容是：

（一）确定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原则；

（二）“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那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372页。

② 《本庄日记》第311—314页和以后部分。

③ 《本庄日记》第328页。

④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卷，资料篇，第101—107页。

⑤ 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64页。

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请上级长官批准”；

(三) 为了让日本国民“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准备作欺骗性的宣传。

后来，日本陆军省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去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这样，它就成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关东军为了实现“以寡制众”的目的，分散中国东北军的兵力，首先派特务头子土肥原用飞机把在大连的山西军阀阎锡山送回太原，令其出兵华北，以牵制东北军，使张学良不能顾及东北；同时土肥原还唆使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军事联合行动^①。另外，又策划在延边、哈尔滨掀起暴乱，并“鼓动蒙古独立”^②，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这些阴谋计划都得到日本陆军中央部的批准。

紧接着，关东军将前述的两门重炮调到东北，以备进攻沈阳城的时候使用。关于秘密运送这两门重炮的情况，岛田俊彦作了如下的描述^③：

“根据以前侦察的结果，了解到攻击奉天城必须用大炮。于是，与陆军中央机构进行商议，结果，决定从日本国内运来两门口径二十四厘米的榴弹炮。从神户运出来时，特意指定客船来装运，在大连上岸时，关东军的武器部工作人员和从旅顺的重炮兵大队调来的支援士兵，都穿上中国式的便服，装扮成当地的码头工人进行搬运。刚巧，那时候正是夜晚最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423页。

② 同上书，第285—386页。

③ 日本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版，第100—101页；又参考《本庄日记》第334—335页。

短的大暑天，大多数中国居民晚上都睡得很晚，并且，他们把床铺搬到房子外边来渡过那难以入睡的夜晚。因此，要欺骗他们是很困难的。所以，把炮身装在木箱里，说是以前大官的棺材。……为了把准备的大炮藏起来，需要造一间十米见方、高七米的马口铁的小房子，这个工程限于每天晚上十二点到凌晨三点这段时间内进行，三天完工。因为在酷暑中搞重体力劳动，有很多人得了夜盲症。当爱看热闹的中国人聚拢来的时候，就甩石子把他们赶跑。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进行侦察时，就装出要把它打下来的姿势，使它死了心，不再飞来。”

一九三一年七月，关东军把这两门重炮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的兵营内，“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①为了做好进攻时的射击准备，关东军的士兵伪装成满铁职工去测量铁路，对张学良军队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每个目标的距离都进行了测量。这时，以板垣、石原为首又作了一次“参谋旅行”。在往“北满”的旅途中，板垣、石原和日本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商谈，准备九月下旬在柳条沟炸毁满铁铁路，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②。一切准备就绪，关东军准备要采取行动了。但日本军部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却说：再“隐忍持重”一年^③，可是关东军急不可待，“要立即着手”。^④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八月间，板垣、花谷被派往东京，向日本参谋本部汇报关于发动“满洲事变”的作战计划，并要求对计划的细节不要干涉，二宫中将、建

① 《东京裁判》上卷，第323页。

② 参考ねず・まさし《日本现代史》7，第163页。

③ 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

④ 岛田俊彦：《关东军》，第94页。

川少将都答应尽力而为。实际上，他们以及永田、冈村宁次都是参与这个计划的^①。

板垣和花谷还与“樱会”头子桥本欣五郎等勾结，约定届时由“樱会”在东京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桥本还为板垣筹划“五万日元的经费。五万日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三百万日元以上”。^②与此同时，军队部署也在加紧进行，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日本军部发表了包括增兵朝鲜（一个师团）的军制改革方案，接着又改革关东军的配备，使其进入临战体制。

4 制造战争借口

万宝山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向中国寻衅，在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村，恶意地挑拨中朝农民之间的关系，制造流血冲突的“万宝山事件”。万宝山地区本来不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日本侵略者却蛮不讲理，蓄意制造这一事件。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长春附近的万宝山那里，有一个稻田公司经理（是个恶棍）郝永德，蛊惑当地的地主，租得萧翰林、张鸿宾等生熟荒地五百垧^③，以十年为期，契约内写明：“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批准，仍作无效”。可是，郝永德又私自将上述荒地租给流浪到东北来的朝鲜农民李昂薰、李造和等九人耕种，也以十年为期，前两项契约都没有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朝鲜农民为要导引伊通河水入田，就强挖壕沟，建筑高坝，而所挖之地，都是中国农民的熟田，且高坝一筑，大批的熟田将被淹没，因而引起当地中国

① 参考ねず、まさし《日本现代史》7，第165页。

② 《桥本大佐手记》，第101—102页。

③ 东北土地面积俗称，每垧相当于七亩。

农民的担心，乃呈诉地方当局。六月七日，长春县政府派员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朝鲜农民不听，将其带到县府查问，供称乃系日本侵略者指使。果然，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竟唆使近百名朝鲜农民前来筑坝，日本便衣警察混在其间，蓄意进行挑衅，还派日本军警前来进行所谓“保护”。中国当局据理向日本驻华领事交涉，求得公平解决，但日本侵略者竟无理拖延，反而督促朝鲜农民加紧筑坝，限令七月五日竣工。七月一日，万宝山的中国农民眼见河水泛滥，约计二十余垧的低洼地将被淹没，乃自动集合五百多人，实行填壕。第二天，日本警察竟公然开枪射击，打伤一名中国农民，捕去十人。然后，又增派日本警察四十多名，携带四架机关枪，前来镇压，其势汹汹，如临大敌。

在这次冲突中，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没有死伤，而中国农民却有负伤者^①。可是日本报纸却大肆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胡说什么在万宝山有很多朝鲜人受伤，煽动仇华情绪，因而在朝鲜国内发生了杀害大批华侨的流血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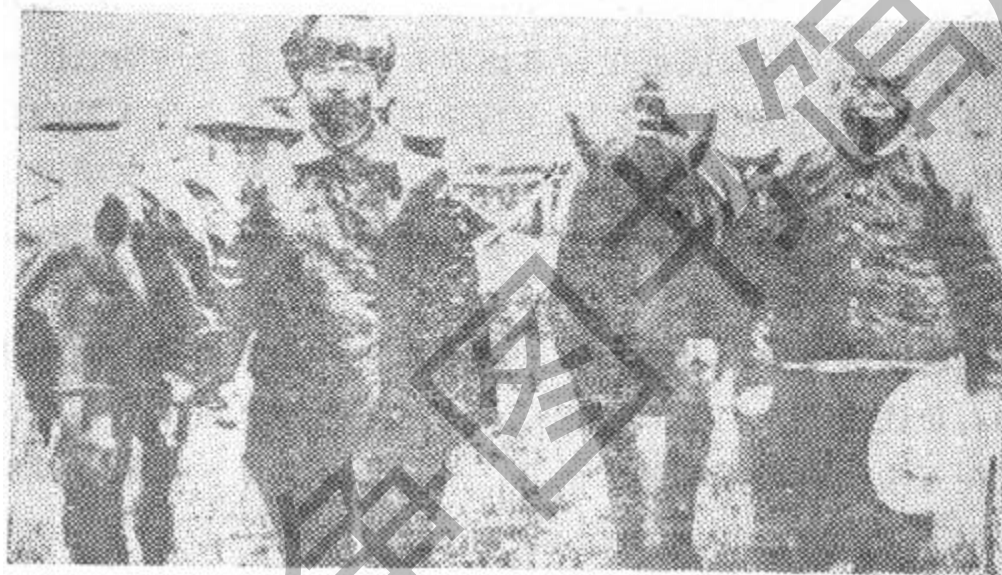
万宝山事件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此事，作为解决“满洲”问题的一种手段，大肆宣传中国不仅“排日”，而且迫害朝鲜人，从而在中朝两个民族之间煽动仇视情绪。实际上，当时朝鲜早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些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残酷剥削的朝鲜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到中国东北。而这些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摧残的牺牲品，到了中国东北以后，却仍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控制，甚至加以利用，因此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日本史学家说得好：“万宝山事件以及报复性暴动的对象，并不是这个事件的祸首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必

^① 参考《太平洋战争史》1，第259页。

须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这就使得悲剧性更加扩大了”。^①

中村大尉事件

日本参谋本部为了侵略我国东北，于一九三一年六月派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隐瞒军人身份，到我国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六月二十二日，当他们到达苏鄂公府时，被关玉衡指挥下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士兵发现，



中村与井杉

看他们行迹可疑，便拦阻盘问，索验护照。因无中国护照，又言语支离，乃引至团部详细审问，从中村的行囊和棉裤里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测绘仪器等多件。在军用地图上，均对照现地加以改绘过，凡是经过的地区、村落、居民、雨量、气候、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当他们从哈尔滨起程之前，未经当地日本领事馆通知中国官方，入境手续极不完备，况且兴安岭地区向来禁止外国人游历，

^① 《太平洋战争史》1。

而中村却隐瞒自己是日本现役军官，冒充是“农业技师”，因而激起中国官兵的公愤，予以处死。按国际公法，主权国家有权处死外国间谍，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竟蛮不讲理，把它说成是“闻所未闻的侮辱”，是“直接对日本皇军的进攻”，一面向张学良提出强硬要求，一面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日本生命线满蒙的危机”，煽起了国民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甚至派飞机散发传单^①，进行战争煽动，狂叫要借此机会“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满洲青年联盟与大雄峰会

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侵略狂潮相呼应，已经踏上侵略我国东北之途的一小撮法西斯匪徒，也疯狂地活动起来。他们在“满洲青年议会”的基础上，拚凑了以满铁人员为主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到一九二九年膨胀到十九个支部、二千七百多人^②。他们在关东军和满铁的支持下，早就疯狂地叫嚷武装占领“满蒙”，建立什么“新国家”。在万宝山事件发生之前，青年联盟的长春支部长小泽开策等，就煽动采取强硬策略^③，终于使这个事件演成为流血事件。以后，他们又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更加疯狂地进行煽动，还拚凑一个“母国访问团”，^④冈田猛马（本部理事）等五名代表，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八日，回到日本各地进行游说，访问报社，召开演说会，极力歪曲“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的真相，大肆叫嚣“生命线满蒙的危机”。大川周明还把他的党徒笠木良明派到“满铁”，拚凑另一个法西斯组织“大雄峰会”，这个会名是根据日本百丈和尚的“独座

① 如金泽第九师团用飞机在他管辖下各地区散发了十万张传单。参见《太平洋战争史》1，第263页。

② 《太平洋战争史》1，第260页。

③ 同上书，第261页。

④ 《本庄日记》，第346页。

大雄峰”这句话起的^①。“大雄峰会”的成员主要是以“满铁”的青年社员为主体。“大雄峰会”和“青年联盟”，在策划和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干了种种罪恶活动，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事端，寻找战争借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师团长会议上公然叫嚷：“满蒙之地，无论在国防上、政治上或者经济上，对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但近来该方面的形势，对于帝国与其说向坏的趋向发展，勿宁说使人感到事态严重”。^②因此，他暗示将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他要求关东军和各师团都要“认真从事训练”，做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以便适应开战的紧急需要。随后，各师团长、联队长根据这一侵略意旨，又回到各有关部队进行战争煽动。

5 “九·一八”事变前夕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日本国内进行了一次异常的人事调动，许多法西斯军官都被任命担任军事部门的重要职务，如今村均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长^③，特别是把侵华老手本庄繁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他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中国东北军的一切内情。这一任命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① 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20—22页。

② 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150页。

③ 今村均曾参与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小矶国昭少将找他谈话时说：“为了解决满洲问题，希望你多出一点力，定于八月一日公布调令。”据今村均说：当时总长是金谷范三大将，次长是二宫重治中将，作战部长是建川少将。见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间的哀欢》，日本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果然，他刚一到任，就立即叫嚣：“满洲形势紧张，必须做好应变的准备”。并煽动部下，说“如有可乘之机，应立即抓住”^①。这实际是侵占东北的动员令。同时，他分别听取了张学良顾问柴山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的汇报，并审查了关东军参谋石原拟制的“作战计划”。^②从九月七日开始，他急忙到大石桥、海城、鞍山、连山关、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③，检阅关东军的所谓“应变准备工作”。他还特别检阅了攻打沈阳城的实战演习，为了牵制驻沈阳东大营的中国军队和袭击飞机场，密令驻抚顺的日本守备队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④。九月十八日上午，本庄繁向关东军发出指示：“一旦有事，各部队宜主动采取积极行动”。^⑤

当时，不仅关东军加紧部署，“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九月八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九月十七日，沈阳日军当局又在沈阳南站附近“忠魂碑”前，召开所谓侨民大会，以“中村事件”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关东军本想在九月二十八日炸毁铁路^⑥，发动侵略战争，但由于消息走漏了，故急忙提前发动。关于这个情况，“樱会”头子桥本写道：

“满洲事变突然爆发前的四、五天，在满洲正计划着重大事件的消息暴露了。……从满洲回来的头山满^⑦扬言，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搞个重大事变，所以，板垣化钱

①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篇，第111—112页。

②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428页。

③ 《本庄日记》，第17—21页。

④ 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17页。

⑤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1，第436—437页。

⑥ 日本绪方真子：《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第98页。

⑦ 头山满，黑龙会的头目之一。

很闹。于是，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①到陆军省询问。由此，事件就暴露了。

于是，陆军三长官立刻在参谋本部开会，决定派建川少将到当地去，想防患于未然。

当天，我象平常一样去上班，由于突然开三长官会议，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探听到上面所说的内容，感到这是一件大事，首先想起的是建川少将和板垣之间有份个人的电报密码，立刻赶到第一部长室请建川把这份电报密码暂借一用。建川从袋里拿出来给我看，我就象抢一样的把它拿到手里，跑到参谋本部的值班室，喊了根本〔博〕中佐，以我的名义向板垣发出密码电报：‘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又马上叫小原、田中把这份密码全部抄了下来，然后再还给建川。

我向建川索取这一密码时，在第一部长室还有小矶军务局长，只是在笑。同时，建川只说了一句：‘桥本干什么？’此后，这一密码对于发动满洲事变及其以后的关东军行动，在通讯联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②

桥本不只是拍了一次密码电报，而是连续拍了三次，鼓动板垣，叫他“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③意思就是叫板垣坚决发动战争，他们在国内发动政变进行策应。碰巧就在这个时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向建川

① 外务大臣币原是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中村事件”，索取日本在满蒙“利益”的，他认为不需要采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因此，在侵略中国东北方式这一点上，与日本军部有些分歧。

② 《桥本大佐手记》，第118—120页。

③ 同上书，第122页。

（作战部长）拍来电报，撒谎说：“不料张政权对我越发轻视，最近以来使用暴力来压迫和侮辱，实在难以忍受”。^①这种谎报军情的卑鄙目的，是为尽早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舆论。他希望建川与小矶军务局长“能亲自来此视察现状”。由此可见，建川、小矶，还有参谋次长二宫重治等，都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中心人物。这些情况说明，他们和关东军是上下勾结的。

形势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关东军的兵力调动和所谓“演习”，日趋紧张，而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之间，人员和电报的往还，也十分频繁。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不但不做对日作战的准备，相反，蒋介石还亲自率兵去围攻红军，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当时，中国东北军虽有二十多万，但其主力大部分开往关内，致使东北防军兵力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②，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显然，这是中了日本一小撮阴谋者的奸计。

日本侵略者为了侵占我国东北，经过多年的密谋和冷酷细致的安排。可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除了被牵制在关内进行军阀混战以外，有的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有的私事缠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还有的是汉奸，暗做投降打算。总之，毫无作战准备。当时，代理东北行政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为其父治丧不归；参谋长荣臻在沈阳为其父祝寿，大操大办。

^① 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间的哀欢》，第187—193页。

^② 当时华北的一个军阀。

这时，李济川^①从张学良、张作相那里回来，荣臻见到他时，马上就问：“副司令和辅帅有何指示^②？”李济川回答说：“辅帅指示：对中村事件，日方要求赔偿道歉，我们都可以担负起来，关于讨价还价问题，等辅帅回来再说”。中国东北当局不是准备抵抗，而是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屈膝求和，以“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为宗旨。

然而，从日本军部到关东军参谋部，经过一系列的紧张策划，已经准备好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当板垣接到桥本的三封密码电报后，更是决定要在建川到达沈阳之前，采取坚决行动。

九月十六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为了向关东军传达陆军大臣南次郎的密令，从东京出发，到中国东北。据说，他的使命是要制止已经半公开的关东军的密谋，“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③他于九月十八日到达沈阳后，根本不想向关东军传达这一紧急命令。日本投降后，田中隆吉^④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揭穿了这个内幕，他说：

“……南陆相即以建川少将为特使，急赴沈阳命令关东军中止行动。建川道：南陆相说，‘无论如何要停止’，而我却无停止的意思。十八日晚抵达沈阳，关东军以为我是来制止他们的，谁也不和我会见，即领我到沈阳饭店。陪伴前往的是花谷少佐。因为我既无强要会见的心意，就和他偕往。在这中间，大炮的声音，震得艺妓发抖。我对她说，不要怕，有我在此。……当晚就宿在艺妓家。一直睡到早上，花谷少

① 李济川，当时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

② 副司令指张学良，辅帅指张作相。

③ 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六十年间的哀欢》。

④ 田中隆吉，也是日本法西斯军官之一。

佐来迎。然后，到关东军军部，而事件却已发生了。我的使命，没有完成”。^①

实际上，建川本人就是策划这个事件的主谋者之一，他怎么会制止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所以人们讽刺地说：陆军大臣重要命令的价值，不及艺妓一夜的恩情。日本的国家、民族命运，就这样地葬送在风流少将的手里。

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 柳条沟事件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开始突然袭击驻有中国军队的沈阳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歪曲说：“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兵在奉天郊外柳条沟炸毁铁路，使关东军采取行动”的结果。然而，历史的真相却戳穿了他们编造的谎言。炸毁柳条沟铁路的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在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的直接策划下，原来打算在北大营附近的道口插入铁棍，用以颠覆列车，只是怕被发现，才改在柳条沟。炸路任务责成张学良的日本顾问柴山的副官今田新太郎执行，于是他便找来一个熟悉爆破技术的工兵中尉河本末守，把事先准备好的黄色方形炸

^①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第326页。